



一场 奇特的战争

黄士良 周智伟 张云 主编

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实

黄河出版社

一场奇特的战争

——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实

黄士良 周智伟 张云 主编

黄河出版社

1999年·济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一场奇特的战争：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实 / 黄士良等著。
— 济南：黄河出版社，1999.11

ISBN 7-80152-147-1

I. …… II. 黄… III. 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 IV. E29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68381 号

书 名 一场奇特的战争

——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实

主 编 黄士良 周智伟 张 云

出 版 黄河出版社

发 行 黄河出版社发行部

(济南市英雄山路 19 号 250002)

责任编辑 卢建明

封面设计 张宪峰

印 刷 济南市市中印刷五厂

规 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53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80152-147-1/E · 015

定 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主 编 黄士良 周智伟 张 云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才兴 王汉涛 华 强
李妙根 宋 科 张 云
张林龙 周智伟 黄士良
黄建强

序 一



20世纪中叶，中国人民获得了独立解放。尔今，文明富强之路也已铸就辉煌。饮水思源，在共和国诞辰50周年的大喜之日，黄士良等主编的《一场奇特的战争——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实》一书，本着缅怀先烈、崇尚先辈，发扬传统，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牢记共和国诞生的血与火的岁月，以便更好地为未来的军事斗争和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之要旨，将1930年8月至1935年11月，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段历史昭示于世，作为对共和国50周年大庆的贺礼，有着较强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

红军反“围剿”斗争这段历史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正如毛泽东所说，“围剿”和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始终伴随着红军坎坷曲折的斗争历程。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形成和成功地应用了一整套适合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大

规模的军事“围剿”，创建和扩展了革命根据地，积蓄和发展了斗争力量，造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格局，在中国革命战争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历史是国家的回忆”。了解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精神动力。决不能让岁月尘封历史。回顾红军艰苦卓绝的斗争史，了解中国革命特点及其道路的曲折性，将启迪我们深刻认识中国国情，认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远意义及其道路的曲折艰巨。更何况红军反“围剿”斗争还有许多精神遗产，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英雄的中国工农红军所表现的那种坚定信念和坚韧不拔的决心与毅力，正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要的精神力量。充分挖掘历史的现实教育意义，是历史工作者的责任。如何让社会更多的人从史著的追叙中，感悟历史广博的内容和深邃的底蕴，是历史工作者的境界。本书著者刻意追求把历史的深度溢于通俗的言表，摒去历史铺述的枯涩。读完全书，我个人认为确有雅俗共赏的感觉。因此，此书也不失为历史新时期一部国防教育之佳本。

1999年3月10日

序二

作为对共和国诞生 50 周年的献礼作品，黄士良等主编的《一场奇特的战争——红军反“围剿”战争史实》一书，其政治意义及其现实启示作用已非常明显。就学术价值而言，它又是一部有史料价值而且写作方法较新颖的历史专著。本书是以红一、二、四方面军及二十五军等的反“围剿”斗争，即以中央苏区、湘鄂西、洪湘区、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湘鄂川黔、琼崖、陕甘等苏区反“围剿”斗争为块，以 1930 年 8 月到 1935 年 11 月反“围剿”斗争的时间为线，详细叙述了红军反“围剿”斗争经历胜利、曲折再到胜利的过程。语言生动形象，史料详细可靠，治学态度严谨。因为著者都是在军队院校从事党史教研多年的专家，他们谙悉历史知识和军事知识，因而能综合两方面的优势，使得本书特色鲜明，既对那场红军反“围剿”的奇特战争重要意义的宏观把握恰到好处，又做到对战争过程和场面的描写让读者身临其境般地直面感悟战争的悲壮激烈。著者重视吸纳学术界研究的最新成果，参阅了大量的军事历史文献，把严谨的历史融于通俗的表达形式，使党史和军事史研究很好地结合，力求使刻板的历史

著作达到雅俗共赏的效果。这条路不是本书作者的新创，但对于从事历史研究的人来说，读罢全书，可能又一次受到启发。一方面，现代学科的综合化趋势已越来越明显，交叉学科的研究往往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学术著作的刻板甚至晦涩，难以普及，社会大众便多从以猎奇为主的通俗演义书刊中误取历史。如何既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正本清源，又以广大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去展示历史，发挥史学的功能，以史鉴今，是史学工作者的责任，也是本书展示的一大特色。

1999年3月10日

目 录

序 一	王邦佐	(1)
序 二	唐培吉	(3)
引 言.....		(1)
一、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红军实行战略大转变		
形势与机遇		(10)
从朱毛红军开始的整编		(12)
中央通过“左”倾冒险主义决议		(15)
毛泽东的策略与红军战略的转变		(18)
二、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		
“剿匪”会议，蒋介石设立“南昌行营”		(21)
罗坊会议，毛泽东的意见占了上风		(24)
敌进我退，隐蔽集中		(28)
“活捉张辉瓒”		(35)
三、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反“围剿”		
“二十万军重入赣”		(40)
再次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		(46)
比邻而居，待机反攻		(50)
半个月打了五次胜仗		(53)
四、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反“围剿”		
国民党军“长驱直入”		(60)

红一方面军主力千里回师	(61)
避敌主力，打其虚弱	(64)
造就了中国最大一个苏区	(70)
五、湘鄂西苏区的反“围剿”	
贺龙出任总指挥	(75)
红二军团南征湘鄂边	(80)
洪湖苏区的首次较量	(84)
调弦口会议奠定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基础	(87)
在挫折中谋求发展	(91)
红三军主力回师洪湖	(94)
六、鄂豫皖苏区的三次反“围剿”	
鄂豫边、皖西先后退敌	(101)
“追剿”扑空，“堵击”挨打	(107)
红四方面军应运而生	(110)
“黄安好汉多”	(114)
七、湘赣、湘鄂赣、赣东北苏区的反“围剿”	
湘赣苏区成了中央苏区的坚屏强障	(122)
湘鄂赣：中央苏区的又一个战略侧翼	(130)
赣东北红十军屡奏凯歌	(136)
八、中共党内“左”倾再唱主角	
九一八促进时局大变动	(145)
王明路线亮出极“左”旗号	(149)
二次会议与六次进攻战役	(155)
九、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鄂豫皖苏区陷落敌手	(183)
寻求新的立足点	(191)
湘鄂西困境难脱	(193)
洪湖苏区也遭“左”祸	(198)

十、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

- 毅然出离南丰：周恩来当机立断 (206)
首战黄陂 (212)
再战草台岗 (217)
红军实行新编制 (221)

十一、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

- 蒋介石推行“堡垒主义”新战略 (227)
红一方面军实施“两个拳头打人” (230)
辗转寻战于敌堡之间 (234)
拒绝毛泽东建议，红军错失良机 (242)
死守硬拼，乞丐与龙王比宝 (248)
从处处设防到被迫转移 (258)

十二、闽浙赣、湘赣、湘鄂赣、琼崖苏区的反“围剿”

- 中央苏区派出抗日先遣军 (271)
湘赣苏区配合中央红军作战 (275)
红六军团突围另辟蹊径 (283)
湘鄂赣苏区反“围剿”由胜而败 (288)
琼崖苏区反“围剿”损失惨重 (292)

十三、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

- 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 (296)
反三路围攻 (300)
三次进攻战役 (308)
反六路围攻 (313)

十四、湘鄂川黔苏区的反“围剿”

- 红三军转战湘鄂川黔边 (323)
展开湘西攻势 (326)
创建湘鄂川黔苏区 (331)
第一阶段反“围剿”走出困境 (334)

引 言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反对国民党军的大规模军事“围剿”，是一场奇特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争范例，也为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和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一块坚实的基石，在中国革命战争史册上，写下了悲壮激烈的光辉篇章，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印记。

敌人的“围剿”和红军的反“围剿”，是中国内战的主要形式。这种形式始终伴随着红军坎坷曲折的斗争历程。“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红军的活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式”^①。红军广大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紧紧依靠人民群众，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粉碎了占据优势的国民党军的连续“围剿”，创建和扩展了农村革命根据地，积蓄和发展了革命力量，造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格局，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的主要方法和革命的主要内容，由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对象所规定、所制约。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对异常强大的敌人，中国革命“不能是和平的，而必须是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91年版，第192页。

武装的”，^①“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②

但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共产党从 1921 年成立直至 1926 年参加北伐战争的五六年内，是认识不足的。“那时不懂得武装斗争在中国的极端重要性，不去认真地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不去注重军事的战略和战术的研究。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③

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懂得了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④这是大革命失败所给予中国共产党人最深刻的启示。

1927 年 8 月 1 日，南昌起义的爆发，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随后，又组织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历史新时期。

由于中国共产党缺乏经验，一开始照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城市工人武装起义为中心的经验，把工作重点仍然放在城市工人运动方面，企图先夺取中心城市，然后再向农村发展。结果，使多数起义武装惨遭失败，少数起义武装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入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革命较有基础的农村地区，得以生存和发展。这反映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1991 年版，第 635 页。

②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487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1991 年版，第 544 页。

④ 同上，第 544 页。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这个规律，成功地把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入农村，并提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道路的主要代表。

1927年9月，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确定的暴动计划，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进攻长沙。当部队进攻受挫后，他正确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革命已经开始退潮的情况下，攻占长沙这样的中心城市已经不可能。在长沙周围的平江、浏阳一带也不宜停留。于是，他毅然放弃进攻长沙的原定计划，率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革命较有基础的井冈山地区进军，并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这就是中国革命史上名闻中外的井冈山革命道路。

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骨干，继续坚持井冈山的斗争。其他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以井冈山为榜样，在当地党组织的领导下，乘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之际，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至1930年夏，全军主力红军已由零星的起义武装发展到10多个军区7万余人，地方武装3万余人，革命根据地和游击区遍及江西、湖南、湖北、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四川、陕西等省100多个县境，其中赣南苏区（后与闽西苏区合并为中央苏区），闽西苏区、湘赣苏区、湘鄂赣苏区、赣东北苏区、湘鄂西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在全国影响比较大，特别是中央苏区，在当时是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红军力量最强，影响最大的苏区。此外，在广东东江、琼崖，江苏苏中，四川东部，陕西等地活动的红军还建立了若干小块根据地和游击区。在苏区内，红军和游击队普遍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建了工农武装，进行了土地革命。这些苏区和游击区，成为红军和游击队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造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局面，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1930年8月，蒋介石即开始部署向各苏区和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从此，反革命的进攻由过去一省或几省地方军阀组织的“进剿”、“会剿”，转入了统一组织指挥的全国性的大规模“围剿”。战争一次比一次更激烈、更残酷、规模更大。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着生与死的严峻考验，苏区人民遭受着深重的苦难。至1935年11月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抵达陕甘苏区，中国工农红军连续遭受了数十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但是，中国工农红军依靠自己无畏的奋斗精神，依靠苏区广大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贺龙、徐向前、方志敏、刘志丹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的领导、指挥下，书写了一部反“围剿”战争史。从总体上考察，这段历史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0年8月至1931年12月，为反“围剿”的胜利阶段。1930年8月，红三军团占领长沙后，蒋介石即命其“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着手筹划对湖南、湖北、江西省境内各部红军的“围剿”。同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即一面委派豫皖边区、豫陕边区、江苏、湘鄂赣边区、湘鄂川边区、江西、赣西、赣南、赣北、福建、鄂东、鄂南、鄂北、豫东等“缓靖区”的督办、司令或总指挥：一面迅速将其主要兵力转向红军和苏区，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并把重点置于中央苏区，企图在3至6个月内消灭红军，摧毁苏区。红军为适应战争的发展，先后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一级的正规兵团，并逐步实行由以游击战争为主向以运动战为主的战略转变。同时采取诱敌深入的方针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接连打破了国民党军的三次大规模

“围剿”，使赣南、闽西苏区连成一片，中央苏区正式形成。与此同时，湘鄂西、鄂豫皖、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苏区也取得了一系列反“围剿”的胜利，苏区得到巩固和扩大。这一阶段，红军累计歼灭国民党军 20 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约 15 万人，基本上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红军的全部作战原则基本形成，为尔后的反“围剿”作战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从 1932 年初至 1934 年底，为反“围剿”的受挫阶段。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中日民族矛盾开始逐步上升为主要矛盾，团结御侮、抗日救亡已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却违背全民族的意志，顽固地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于 1932 年 5 月又向各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并把重点首先置于鄂豫皖、湘鄂西苏区，尔后转移兵力，全力“围剿”中央苏区。这一阶段，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加紧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鄂豫皖、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反“围剿”相继失败，红军主力分别退出苏区，转移到川陕和黔东地区开展斗争，创建新苏区；琼崖苏区的反“围剿”遭到失败，红军独立师大部损失，余部转入母瑞山区坚持游击战争；红二十五军进行了七里坪战役，部队遭受很大损失。在此期间，中央苏区进行的六次进攻战役，除漳州战役、乐安宜黄战役外，其他战役都未达到预期目的；第四次反“围剿”虽然取得了胜利，歼灭蒋介石嫡系部队近三个师，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光辉范例，但是，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由上海到达中央苏区后，全面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并被斗争实践一再证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承认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应该充分地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兵团和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

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而是机械地照搬外国的经验，主张单纯靠主力兵团的所谓“正规”战争。他们把当时红军正当的游击战当作所谓“游击主义”来反对，主张“进攻路线”，反对“诱敌深入”；主张阵地战，反对运动战；主张战略速决战、战役战斗持久战，反对战略持久战、战役战斗速决战；主张“全线出击”、“两个拳头打人”、“御敌于国门之外”和“分兵把口”、“全线抵御”、“短促突击”等，同敌人拼消耗，反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从而，使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苦战一年之久，最终失败，中央红军主力被迫于1934年10月举行战略转移。其他苏区的红军也相继退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至此，长江南北大部苏区陆续沦陷于国民党军之手，留在苏区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也先后实行战略转变，分散开展游击战争。这一阶段，红四方面军由于没有机械地执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从而创建了川陕苏区，并采取“收紧阵地”的作战方针，连续取得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的胜利，使川陕苏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部队的军政素质进一步提高。

第三阶段，从1935年1月到11月，为反“围剿”的恢复和发展阶段，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后，中共中央在此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纠正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四年之久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回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从而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不仅为胜利完成长征，战胜张国焘右倾分裂主义提供了根本保证，而且为红军反“围剿”斗争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诸如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苏区的两次反“围剿”胜利，红二军团、六军团在湘鄂川黔苏区的反“围剿”胜利。特别